



再版前言

《北京城——营国之最》一书，自初版问世至今整整五年。不想原本所印的 12000 册书，竟早已在书店售罄。这既是读者对本书的厚爱，也说明人们渴望了解北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而这恐怕也正是中国城市出版社再版此书的缘由。

此书原本是《北京旅游文化丛书》中的一种。当时由于时间仓促，书中的内容多有不尽人意之处。而此次再版又由于同样的原因，尚未能得以了却原先的遗憾。仅增补了“南北往来的要津——卢沟渡口”一节，对全书的某些地方亦作了修改和补充，谨请读者鉴谅。

北京，在改革开放中发展之迅速，举世瞩目。她的城市建设速度，更令人有“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惊叹。但同时，她也与世界上所有的历史文化名城一样，存在有一个既要保护古都风貌，又要更新城市、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问题。

前人留给我们的是一座完整的历史文化名城——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我们留给北京，留给后人的又该是什么？大而言之，在拥有 960 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小而言之，在拥有 1.68 万平方公里的北京市，能否容纳，又将如何容纳这仅有 62 平方公里的北京古城。

源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几经沧桑，几度风雨，现而今只剩下茫茫沙海上的金字塔和木乃伊供人凭吊了。作为一面镜子，它留给我们的启迪在于：源远流长的古都北京，如今正在经历着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从整体上保护古都风貌”这一历史性的决策，正面临着实际建设推进的巨大挑战。是让它成为现实，还是让它成为徒然的空气振动？

记得在北平解放前夕，为了保护这座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名城，我们党作出了极大的努力。当时的舆论也认为，北平一旦毁于兵燹，就会遭到人民的唾骂，成为千古罪人；而实现和平解放，就将为人民立新功，并名垂青史。

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保护北京城的整体格局和现在的文化古迹，国务院和北京市政府公布了一批又一批的文物保护单位。而如今已是第五批了。

纵观整个世界，无论在西方抑或是在东方，拔地而起的所为现代化建设各国皆有，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随处可见。可惟有这源远流长，承袭并积淀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古城，可说是北京所独有。如果因为改造旧城而拆迁，甚至永远地拆毁这饱含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遗存，无异于自毁“长城”，自捣明珠。而在当今的社会的发展中，如不为眼前的一得之利，而保留住东方文明的精华，继承并壮大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这个“根”，就是保留住了我们的竞争之道，致胜之道。

作者

1996 年 5 月



写在前面的话

北京，多么美丽的名字，多么令人神往的地方！

多少年来，人们都以能来北京旅游观光，视为人生一大快事，都以叙述有关北京的山水风物、名胜古迹，视为美谈。而今日的旅游者，也早已不满足于那种仅仅是为了“看热闹”、“好玩儿”的情趣了。他们在旅游观光的同时，还要对自己所见到、所听到的事物进行追根溯源；他们也不再把旅游观光，仅仅看作是一种消遣，而是把它当作对科学文化知识的追求。

应该说，都城的出现，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是伟大文明的创举，是人类的骄傲。而中国的都城又在世界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有人对汉字中的“國”字，作过这样的解释：“國”，字就是以‘戈’，亦即武器，守卫一定的土地；‘口’，它围绕以城墙；‘口’，总之是表示都城的意思。而在周代早期的铭文中，这个“戈”字是在城墙外面的，城墙里面仅有一个“口”字，即“阨”。可是，到了周代中期，这个“戈”就已经包在城内了，即“國”字。《周礼·考工记》中的“匠人营国”，就是“营建都城”的意思。

“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释名》。据《水经注》所记，我国历代列国的故都竟有 180 处之多。如果加上北魏以后的历代都城，总数大约在 200 个以上。这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与之相匹比的。而中国都城的名称自有文字以来，曾称之为京、都、国、邑、京师、京辇、京城、京华、京阙、京畿、国都等等。

北京，如果从周初召公分封，并在今广安门附近建立蓟城至今，已有 3000 多年的建都历史。即使是从金建中都于北京迄今，也有 800 多年的历史了。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成为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40 年来，北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正以她巨人般的脚步，向前迈进着。

我并不是北京人。我对北京的热爱，在起初仅仅是因为她是我们新中国的首都。但是，当我有幸来到北京大学上学，而且开学后的第一课，又恰巧是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讲“北京”。正是这终身难忘的“第一课”，才真正把我引进了一座宏伟瑰丽的科学殿堂。她那丰富的蕴藏和探索不尽的奥秘，一直在深深地吸引着我，并促使我为她去呕心沥血、殚精竭思，使我打从心底里产生了对她的无限热爱。

30 多年过去了，尽管我对北京城的了解，还十分肤浅，但是，我却从中领悟到了“知之愈深，爱之愈切”的哲理。也因为这样，我才愿意沿着师长开辟的道路，把对北京城进行探索所得到的心灵感受书写出来，与企望了解北京的朋友们一起，去倾注心血继续揭示她那令人神往、却又探索不尽的奥秘。

如前所述，北京即使是从金建中都迄今也已有 800 多年的历史了。800 多年来，尽管建都的城址略有迁徙，但却始终

没有离开“北京小平原”。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里成为她孕育、发展的基地，并绵历数千年而不衰？

在我国，历代的封建王朝都把建立都邑，作为立国的根本大计。而且早在周朝时，对建都的位置、规制、布局等就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形成了一套特有的都城规划理论。那么，她又是怎样的继承和发扬这套理论，并使北京城的修筑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的“营国之最”呢？

了解她、继承她，然后保护她、改造她、建设她，这是我们所承担的历史使命。



北京城原始城址的确立

居住在北京的人，抑或是来北京旅游观光的人，总会自觉不自觉地提出这样的问 A 北京城怎么偏巧会建在这里？

早在本世纪 40 年代 当 G·泰勒教授被当选为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主席的时候，按照惯例，他发表了足以代表他学术水平的“就职演讲”。在这个演讲中，他竟以相当大的篇幅来讨论北京城的早期发展与其城址的关系问题。他一再宣称，想要说明北京城在其原始城址上发展起来的环境因素是困难的。因为北京城也只是辽阔的冲积平原上众多城市中的一个，它的城址并不具备任何明显的地理特征。于是他便推论说：“看来在北京城城址的选择上，显然包含有许多‘人’的因素。在古代，巫师们认为这一城址是特别吉利的。”“由于巫术上和政治上的原因，导致了这个城市的诞生。当时蓟是燕国的首都，以此为起点，似乎再没有其它城市相与抗衡。”

把北京原始城址的选择，归因于古代方士的巫术，用哲学的名词来说，叫做“不可知论”。至于传说中的有关北京城城址选定的故事，那简直有些近乎“天方夜谭”。

是的，北京城址的选定，与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出现一样，都有它孕育、产生、发展的规律。众所周知，城市的出现是

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城市一旦出现，又必须具备一个足以满足它的发展要求的固定场所——城址。

我们对北京城的认识，也应该由此伊始。

（一）营建都邑——封建王朝立国的大计

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城市只存在于离现今最近的5000年中。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社会从数十万年前的洪荒时代，不断演进，以至出现了标志着人类文明的城市。而如今，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已拥有数百个大小不同的城市。它们犹如天幕中的星辰，闪烁着耀眼的光华。北京城便是这众多星辰中，最明亮的一颗巨星。

人类曾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没有、也不需要国家和城市。当然，也就不知道国家和城市为何物。然而，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而使社会分裂成为对立的阶级时，国家和城市才因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他又说：“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城墙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

中国的阶级社会，早在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夏代即已开始。那时，社会的生产力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一夫一妻的家庭制度和传子制度已经确立，农业生产已经发展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农业。这就是说，在夏代，公有制已经破坏，私有制正在形成，而这也正说明夏代是由原始公社向奴隶制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

战国时，有人把这个期间的社会状况说成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物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记·礼运》）这是说社会发展到了这一时期，已经分裂为互相对立的阶级，人剥削人的现象已经存在，私有制已经确立。公有制下的“选贤与能”已经变为争夺和把持权力的“大人世及”。在这样的情况下，原先用于防护自身而不受野兽侵害的石墙、沟池，也就成了防御保护私有财产和“大人”们生命安全的工具了。所以“夏鲧作城”（《吕代春秋·君守》）虽是一种传说，但是揆度当时社会经济状况，这个传说却是与实际相符合的。

这一切说明，夏代确实是由原始公社向奴隶制度转变的过渡时期。因而，也是我国古代城市开始产生的时期。

近几十年来，殷墟的科学发掘，十几万片甲骨和大批青铜等器物的出土，众多的墓葬和宫殿遗址的发展，已足以说明，河南安阳是我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和实物证据的最早的古都。

当然，中国古代城市的大量兴起，主要还是在周以后的封建时代。这是因为，周初是中国古代农业开始大量发展的时代，同时剥削制度也有了很大改变。这时，由剥削农奴的剩余劳动而形成了大量的财富，私有制也早已确立。因而，城廓沟池的防御保护也就较之以往更为必要。所以，封建统治者把筑城——营建都邑，看作是立国的一项根本大计。所谓“立国”便是在自己的封域内，选择适中的地点，来营建足资防守的城池。而立国之后，便要小心翼翼地保持自己作为政权基础和统治中枢的都邑。丧失掉城池，等于丧失掉一切。历代封建统治者，从来都把保城作为保国的代名词。“倾城就是倾国，城坏就是国破”，城池的存亡直接标志着国家的兴亡。

作为城市，其兴起的地点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但是，作为营建都邑的地址，却有着严格的规定：“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吕氏春秋·君守》）也就是说，都邑所在的地点要适中，形势应重要，出产要丰富，水源也不缺等等。管子则总结出了“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管子·乘马》）的选址原则。

可以说，北京城城址的确立，正是符合这一原则的。

（二）“北京湾”及其周围的地理形势

如前所述，历史上城市的出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是伴随着阶级的分化和对立而形成的。但是，一个城市一旦适应社会经济的要求，而开始出现的时候，它就必然要具备一个足以满足它发展要求的固定城所。因此，如果说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城市出现的决定因素，那么适当的城址就是城市发展的必要条件。

这就是说，一个城市城址的确定决不是偶然的。它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由特定的空间关系所规定的。而自然环境，便是这一空间关系的重要方面。

远在距今 7000 万年以前的中生代时期，这是一个在我国大陆和亚洲东部地壳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其表现为强烈的褶皱断裂运动和差异性升降运动，以及与褶皱断裂相伴生的、历史较长、次数频繁、范围较广，又表现得十分强烈的火山活动和岩浆的上升和侵入作用。而与此相关的则是断裂上升山地的剧烈冲刷破坏和断陷盆地的巨厚沉积作用。由于这些特点在燕山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所以在地质史上就把这一时期的运动统称为“燕山运动”。

北京地区的地质构造轮廓，基本上就是在中生代末燕山运动以来形成的。以后，一方面是断裂升降，其中表现为东北、北部山区和西山的大幅度上升，另一方面是伴随着大规模的岩浆侵入活动；而原先趋于下降的平原地区，则继续大幅度下降，接受了巨厚的沉积。从而奠定了今日北京地区的山脉、盆地和平原，其陡缓起伏虽异常强烈，但总的趋势却是西北高、东南低。

源自现山西、内蒙，流经河北、北京、天津的永定河，切穿了北京西部山地的重峦叠嶂，在今三家店附近出山之后，即荡涤于平原之上，并把它所携带的大量风化碎屑物堆积其上。永定河与源自燕山山地的潮白河、温榆河等共同铸就了一个面积广阔的洪冲积扇。这便是人们在日后所见的“北京小平原”。

自西向东连绵起伏的燕山山脉，横亘在北京小平原的北部，它与南来的太行山山脉，在南口的关沟附近相交汇，形成了一个弧形的山弯，状若围屏，只有正南一面开向平坦开阔的华北大平原。这样，就在地形上形成了犹如一个半封闭的海湾，人们便又把它称之为“北京湾”。

正是这个“北京湾”，竟成了现今北京城的“摇篮”。

（三）北京城原始城址的确立

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位于北京西南约 50 公里的周口店，发现了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的“北京人”和“山顶洞人”遗骨化石。这一发现，不仅为研究人类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科学依据。而且使人们得知，北京地区也是人类最早的活动地点之一。

前些年，周口店东南琉璃河商周遗址的发现、发掘，又

证明远在 3000 多年前，周初燕国的都城就设在该地。然而，北京城并没有从这里发端。它是在燕吞并了周初的另一个封国，即位于北京小平原上的蓟，并把蓟城作为燕国的都城之后，在蓟城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里成了北京原始城址的呢？

城市，从它出现的那一天起，便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生活聚落。它不是孤立的，与外界隔绝的。它是一个在范围大小不同的地域空间中，或大或小的“焦点”。城市的生活资料来源于四面八方；而在城市中所进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种种社会活动，又是以一个相当宽广的地域，作为其服务的对象的。所以，城市离不开对外联系，而对外联系的便利与否，又与城市本身所处的地理位置有着密切的关系。

如前所述，在北京小平原的北部被连绵起伏的燕山山脉所阻隔。但是，燕山山脉又是一条镶嵌着若干个山间盆地的断块山地。在地势上是呈梯极状由东南而西北逐级上升的。其间河谷发育，山口众多。如今的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南口、张家口等，都成了南北往来的天然通道。多年来，从燕山南北两地所发现的、大量的文化器物也证明：燕山山脉尽管给南北的交通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并没有阻挡南北文化的密切联系。

另外，如果从今天的自然地理条件来看，山东境内高度发达的新石器文化，即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也应像河南北部的新石器文化那样，大量地、持续地传入北京地区。因为在北京和山东之间，是由辽阔的华北平原连接着的，而且几乎是畅通无阻的。但是，考古发掘发现，北京一带及其以北地区发现的山东新石器文化因素却十分有限。

这又是为什么呢？殊不知华北大平原系冲积而成，地势低平、排水不畅。从太行山东下的大小河流在出山之后，流速骤减，水中所携带的大量泥沙遂沉积于河道之中，河床不断抬高，造成河水泛滥，并在低洼处积聚起来，形成了片片湖沼。《尚书·禹贡》中便有黄河下游“播为九河”的记载。当时自大城、唐官屯以北，文安、霸县以东，宝坻、玉田以南，即在地形图上为 5 米等高线以下，几乎都是与渤海相连的一大湖沼区，名“雍奴薮”。其西，即今白洋淀上下，又是另一大湖沼区，名曰“涿易巨浸”。就是在旧日的北京周围，也曾有东淀、西淀、三角淀、瀑河淀、延芳淀等，号称“九十九淀”。其南则有白洋淀、文安洼等。正是这大面积湖沼洼淀的存在，阻滞了人类早期在这一带的交往。并迫使南北之间的交往，只得沿着太行山东麓一线、地势较高的山麓地带进行。河北省平原地区所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大多分布在与太行山东麓相毗连的西部地区，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由此可见，沿太行山东麓这条南北交通线，在古代的华北交通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然而，它也只有越过永定河的渡口之后，才能与北部、东北部的广大地区进行交往。

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曾对越过永定河渡口之后的交通作了如下的推测：西北一路由南口直上蒙古高原；东北一路出古北口，穿越平缓的山地丘陵地带，通向松辽平原；正东一路，横越北京小平原，沿燕山南麓直趋海滨，然后出今之山海关直下辽河平原。反之，如果从山后地区南下华北大平原，也无论循哪一条路线都必须先汇集到北京小平原，然后再经由古代永定河的渡口，合为一路，即沿太行山东麓径直南下。

这一交通形势使我们看到，尽管周初在太行山的东麓也

曾出现过象燕都这样的古代都城，还有后来的燕下都这样的名城。但是，这些城市都只是太行山东麓大道上的中间站。这与位于该大道北端分岐点上的蓟城的交通地理位置，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它们虽可以称雄一时，但毕竟难于长久。而位于交通枢纽位置上的蓟城，到战国晚期，便已成了“勃碣之间一都会”了。

上述情况说明，交通地理形势对永定河南北城市发展的不同结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沿太行山东麓北上的大道，在永定河北岸开始分岐，又是其中的关键所在。至于北京城并没有在紧临永定河的渡口孕育发展，却移向东北距渡口约十公里的地方。侯仁之先生对此也作了以下的说明：

“古代永定河的渡口附近，因为交通荟萃，似乎应该是最适宜于一个城市诞生和成长的地方，如同我国不少依傍江河渡口的城市一样。但是，永定河是一条流量很不稳定的河流。在夏季经常遇到洪水暴涨，泛滥无常，这就严重地威胁着一个城市在这里成长。因此，从由南而北的大路在穿越永定河进入北京小平原之后，仍然继续前进，只有在距离渡口最近，而又最不容易遭到洪水威胁的一个原始的居民点上，才开始分道扬镳，朝着不同的方向前进。

这个古代大路分岐之处的居民点，便成为当时沟通南北交通的枢纽。当社会经济发展具备了一个城市诞生的条件时，处在这个枢纽位置上的居民点，就十分自然地迅速发展起来，终于驾乎其它的居民点之上，成为当时一个小的奴隶制国家的统治中心。

这就是燕国的蓟城。

从自然地理位置上讲，蓟城正好处在古代永定河冲积扇脊背的一侧。这里地势平缓，土壤肥沃。其地又正当潜水溢

出带，水源丰沛，便于凿井汲水。正是从这个地理位置上，蓟城的原始聚落开始发展起来，并代替了永定河上的古代渡口，而成为南北交通上名副其实的枢纽。实际上，这也就是北京小平原面向中原腹地的唯一门户。

四

北京城历史演进的轨迹

我们在了解到北京城原始城址确立的原因之后，自然就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北京城又是怎样演进到今天的，或者说，它是怎样从一个部落、方国、诸侯领地的中心，进而成为统一封建国家北部地区的重镇，以后又逐步发展，上升成全国首都的显赫位置的？

研究北京城市发展的史学家们认为，北京作为文化古都 and 现代城市，有一个由低到高、从小到大的演进过程。尽管其中也曾出现过一些曲折的反复，但总起来说，这个城市的地位越来越高，作用越来越大，而其机制与功能自成系统地发展，辐射全国绵历千年，至今不竭。

现在，就让我们沿着北京城历史演进的轨迹，作一点粗略的追寻。

（一）远古的居民

在现今北京城的西南，离城 50 公里的房山周口店，曾经生活过我们北京最远古的居民。他们就是距今 70 多万年前的“北京人”。

“北京人”居住在周口店一座名叫龙骨山的天然洞穴里。

当时这一带的地形基本上和现在一样，但气候要比现今温暖湿润。山岭上密布着葱郁的森林，有松、柏、桧、桦、朴和紫荆等树种。朴树的肉果，味甘可食，是“北京人”爱吃的果实。在丛林中有虎、豹、狼、熊、梅花鹿、野猪和大猕猴、鬣狗等。周口河从龙骨山的东麓蜿蜒而下泻入平原。河的近旁有水草丛生的沼泽，巨大的水牛，还有水獭、河狸和水龟等，时常在这里活动。在平原的草地上，则有成群的野马、野牛和野羊在那里追逐嬉戏。秋末冬初，扁角肿骨鹿也从远方来到这里和驼群为邻……“北京人”在几十万年的漫长岁月中，就是这样祖祖辈辈地劳动、生息、繁衍在这样的洪荒世界里。他们用最原始的生产工具和武器——木棒和石器和大自然展开了斗争。他们采集植物的根、茎、果实和种子；捕获林中的走兽，共同劳动，共同分享劳动成果，过着平等然而也是艰苦的原始生活，成为北京地区最初的主人。

“北京人”所处的时代，在人类经济文化史上属于旧石器时代初期。因为他们的石器是用原始的打制方法制成的，技术还不太熟练。他们在附近的沙滩上选取石英岩、砂岩、燧石等作原料，做成各种形状的石器，用于采伐树木，刮削兽皮和切割兽肉，同时也用作为狩猎的武器。在“北京人”居住的洞穴外面，还发现了用火烧过的灰烬和兽骨；在洞穴里面，也发现了一堆堆很厚的灰烬、木炭、烧骨和朴树籽。这是“北京人”已经懂得用火，并且学会了保存火种的证明。

人类学会使用火，是人类从动物界分化出来，并跨入文明世界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志，它宣告了人类黎明时代的来临。

以后，在距今大约 20 万年以前，他们的体质特征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即由猿人变成了早期智人——新洞人。大约在

两万年以前，北京出现了新的人类即“山顶洞人”。他们同“北京人”、“新洞人”虽相隔了数十万年，却都生活在同一座小山的不同山洞中。他们的体质形态与现代人已基本相同。在“山顶洞”遗址中出土了石器和装饰品，有穿孔的兽牙、海蚶壳、小砾石、石珠、骨管和鱼眼骨等。他们已经掌握了刮挖、磨光、钻孔等。特别是在山顶洞出土的骨针，长 82 毫米，表面光滑，一头是锋利的针尖，另一头是利器钻挖成的针鼻儿。

“山顶洞人”已经学会了用骨针和骨锥缝制用兽皮做成的衣裙，赤身裸体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另外，在“山顶洞人”尸体周围撒有红色的赤铁矿粉末，这或许是当时人们喜爱红色，但也有可能是原始宗教观念萌芽的表现。而山顶洞中所发现的渤海沿岸所产的蚶子壳、宣化一带所产的赤铁矿和黄淮流域以南所产的巨厚蚌壳，说明当时北京地区的居民已经和很远的地区发生了交换关系。“山顶洞人”生活的时代，在考古学上称之为旧石器时代的晚期，他们已经进入了母系氏族公社的时期。

在门头沟区东胡林村西侧，发现了距今一万年左右的人类骸骨化石。在这里清水河蜿蜒东流，注入永定河，河两岸是层峦叠嶂，间或是依山面水的低矮黄土台。北京先民的遗骸就掩埋在黄土台地上的墓葬里。这便是在考古学上称之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东胡林人”。

“东胡林人”的体质特征已与现代人基本一样。而且已经离弃了祖先们世代居住的岩洞居所，开始在谷地间的黄土台地上，开辟了新的劳动和生活的区域。之后，他们又沿着河流，走出谷地，来到平原上，在河流两岸的台地上或河流交汇处，选择高亢平坦的地方，建立起了原始的聚落。这些地方水草肥美，又有膏壤沃土，是种植庄稼、放牧牲畜、制造